

“漢語新文學”的正名論和學術實踐

黃維樑

[提要] 朱壽桐提出“漢語新文學”的概念來整合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台港澳文學以及海外華文文學等學科。他認為目前的這些稱謂“含混”、“嘈雜”、“紛亂”，“中國現當代文學”之名最不妥當，“漢語新文學”這個概念則“簡潔而準確”。朱氏的“正名”說引起學術界的熱烈討論，支持者眾。本文深然其說，並指出學術等各個領域正名的重要，認為制定“嘉名”要考慮科學性、道德性、藝術性等因素。本文進而指出，“漢語新文學”正名的學術實踐之道應該是：（1）持續使用“漢語新文學”之名：著述、教學、編訂課程時都使用；（2）以“漢語新文學”為題，定期舉行學術研討會，發表高水平的論文，並時加宣述用“漢語新文學”而不用“中國現當代文學”等名稱的優勢；（3）向學術行政決策部門力陳“漢語新文學”名稱的意義和價值，為學科正名。本文附帶評論近年的“華語語系文學”說，認為其名不正，其意可議。

[關鍵詞] 漢語新文學 中國現當代文學 正名論 朱壽桐

[中圖分類號] I206.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3)03-0188-07

一、“漢語新文學”一名的提出：意義和迴響

2008年5月，澳門大學舉辦“漢語新文學”講堂。在講堂上，該校中文系朱壽桐教授表示，應該通過“漢語新文學”概念的建構來整合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台港澳文學以及海外華文文學等學科；這個概念“簡潔而準確”，有學科、學術整體統一之效。朱氏認為，用現代漢語寫作的新文學，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在台灣、香港、澳門等其他區域，以至在別的國家，所構成的乃是整一的不可分割的“漢語新文學”。漢語作為漢語文學“共同體”的劃分依據，“既能顯示出新文學傳統的本質力量，又能克服由於國族分別或政治疏隔對漢語新文學加以人為割裂的現實難題”。^①朱壽桐是講堂的發起人，在開講儀式上作了《漢語新文學概念建構的理論優勢與實踐價值》的報告。在此之前，4月份在布拉迪斯拉瓦-維也納召開的“以文會友——世界漢學家會議”上，也作過主題相近的報告。

此報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台灣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李瑞騰在主持開講儀式時指出：漢語新文學概念會帶來文學研究的新局面，可將台港澳和海外華文文學學科整合進漢語新文學研究之中。朱壽桐記述：“李氏指出，漢語新文學概念的提出，有理由、有條件，也可能有足夠的氣勢

醞釀成為一股學術運動，對此他自然樂觀其成。”南京大學教授、澳門科技大學客座教授汪應果贊同這一概念的提出，他認為應該從全球文化戰略的高度來審視這一概念的意義；“漢語文學的對外拓展是大國崛起的文化需要，中華文化在整個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價值和影響的確立與發揮，正需要以漢語為媒介的整個新文學力量的整合和魅力的展示。”還有其他多位與會者都大力支持朱氏的主張。^②

兩年後，在2010年4月，澳門大學中文系舉辦“漢語新文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發佈由朱壽桐主編的新著《漢語新文學通史》上下卷兩大冊，卷首是朱氏撰寫的《緒論：漢語新文學概念建構的理論優勢與實踐價值》，此文顯然是要為一個學科正名。開宗明義朱氏寫道：

漢語文學研究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輝煌的積累，其中新文學的研究經過近百年的建構、開拓與發展，亦以其不斷擴大的規模與日益充實的內蘊，成為當今世界文學研究的學術格局中頗為活躍的部分以及頗具潛力的學科。令人遺憾的是，這樣的學科目前尚無法得到有力、有效乃至有準備、有意識的整合，而須以“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新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台港澳文學”、“海外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等內涵齟齬且外延含混的臨時、零散的概念作紛亂、嘈雜的學術呈現。^③

目前的稱謂“含混”、“嘈雜”、“紛亂”，朱壽桐要撥亂反正；他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之名最感不正。《緒論》指出“中國現當代文學”一詞是個“臨時性學術概念”、“明顯拼湊型的學科名稱”，它顯露“某種稚拙與不嚴密”，而且很難用西方語言“作準確的翻譯與表述”；這樣不妥切的一個“官方”學術概念，卻為什麼被學術界沿用呢？朱壽桐直率指陳原因：研究者“有意保持一種世故的緘默，或者刻意體現一種虔敬的服膺，當然還有粗略的疏忽”。

朱氏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一名的劣評，筆者完全同意。^④這個稱謂確是“含混”、“拼湊”、“紛亂”的，而它的語病不止於此。它和中國新文學、中文文學、華文文學、華語文學的一個共同語病是：中國或中華民族由多個種族構成，有多種語言，而學術界使用中國新文學、中文文學、華文文學、華語文學等詞的時候，絕大多數指的是用漢語書寫的文學；換言之，這稱謂名不副實。朱壽桐在《緒論》中這樣說：“正如人們早已質言過的，它（中國現當代文學）號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卻約定俗成地放棄了對漢語文學以外的中國其他民族語言文學的涵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長期以來以‘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之名行漢語新文學研究之實，自說自話地縮小了研究範圍，典型地屬於一種名不副實的學術操作。”他主張不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新文學”、“世界華文文學”等名不副實的稱謂，而用準確、正確的“漢語新文學”之名。

“漢語新文學”的提法還有其統合的意義。朱壽桐進一步指出：“沒有人懷疑海外漢語文學寫作與中國現代文學傳統之間的血肉聯繫，漢語新文學無論在中國本土還是在海外各地其實都是一個分割不開的整體。”我們可補充說，海外漢語文學寫作與中國古代文學傳統之間，也有聯繫；因為文學寫作有其傳承，有源有流，海外漢語文學只要是用漢語來寫作，就必然有漢語文化、漢語文學的元素在其中。如果截源斷流，海外漢語文學就不可能存在。只要看看移居美國的白先勇（例如其《遊園驚夢》）、嚴歌苓（例如其《除夕·甲魚》），移居澳洲的梁羽生、陳耀南（二位都寫作舊體詩詞），出生於馬來西亞的夫妻作家王潤華（例如其《內外集》）、淡瑩（例如其《楚霸王》），整體、聯繫、源流之說，可思過半。

朱壽桐還從非政治化的角度看“漢語新文學”的整合性。他在《緒論》中指出，“漢語新文

學”這個概念的最大優勢是“超越乃至克服了國家板塊、政治地域對於新文學的某種規定和制約，從而使得新文學研究能夠擺脫政治化的學術預期，在漢語審美表達的規律性探討方面建構起新的學術路徑”（第8頁）。是的，朱氏這本《漢語新文學通史》不理“國家板塊”，把韓國許世旭的漢語詩文也述評了。我們還可順提一筆：“漢語”、“漢詩”的稱謂，在韓國是標準的說法。

世間的事物，或分或合，可分可合，朱壽桐提出了可行的、統合的觀點，超越了國家板塊、政治制約的觀點。世間的事物，有時合既困難，分亦不易。在發佈《漢語新文學通史》的“漢語新文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朱氏宣讀他一篇題為《論漢語新文學的文化歸宿感》的論文。他在文中重申漢語新文學這個概念的“簡潔而明確、準確而清晰”^⑤；在圍繞歸宿感這一主題的諸般論述中，他以白先勇為例，說明在“高速流動性的世界”中，明確劃分作家歸屬的困難。白氏出生於大陸，曾短暫居於香港，在大陸、香港、台灣、美國接受教育，在台灣、美國創作，長期居於美國，在台灣、香港、大陸出版其著作，著作擁有上述各地多量漢語讀者，他又在台灣、香港、大陸、美國等地參與各種文學文化活動。他的創作地包括美國，他是美國公民。朱壽桐說，假如基於這兩個因素，就把他的作品“算作非中國文學或非台灣文學顯然並不恰當”^⑥。小說家施叔青在台灣、美國、香港、台灣之間，流動性也很大，怎樣歸屬呢？類似的例子如馬森、陳若曦、韓牧，還可舉出很多。

二、“漢語新文學”·正名·嘉名

“漢語新文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朱氏對“漢語新文學”的提法，以及《漢語新文學通史》的發布，引起了共鳴和迴響。“漢語新文學”是個美善的名稱，是個“嘉名”。屈原作《離騷》，開宗明義道及父親給他取了美善的名字：“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怎樣賜人、賜物、賜事以嘉名，不是小學問；如何命名、更名（更改名稱）、正名，我們有姓名學、人名學（anthroponymy）、命名法（nomenclature）種種講究。在政治、倫理、宗教、社會、商業、學術等各方面，我們都需要嘉名。嘉名就是真、善、美的名稱。名是表，實是質；名稱反映實質、反映真實，即名實相副，這是真，或者說這是科學性考慮。名稱不引起負面的聯想，它與人為善，這是善，或者說這是道德性考慮。名稱簡潔、文化含金量大、寓意優美、引起高雅的聯想，這是美，或者說這是藝術性考慮。當然，名稱的真與善，以至名稱的真與善與美，有其相互間的關係。在同一種語言中，命名、更名、正名的講究如此；在不同語言的翻譯中，名稱的講究也如此。

楚是地名、國名，這地方的文學作品名為“楚辭”，即楚的文辭。“楚辭”之稱名實相副，這是真；“楚辭”二字簡潔，這近乎美。“楚辭”的一位作者屈原，“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其名與字既善且美。中國歷代官職的名稱眾多，且基於種種因素而名稱有調整、更動，要準確全面把握這方面的知識，殊非易事；要析論其真善美，更是難事。^⑦全球化的現代社會，人事物種種現象與問題紛繁錯雜，命名、更名、正名之事，學問更大。數十年前，在美國的大學，負責美國境外來校就讀學生事務的部門，名為“外國學生辦公室”（office of foreign students），後來大家認為外國（foreign）一詞太“見外”了，乃易名為“國際學生辦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最近二十年來，很多大學認為“國際學生”（international students）的名稱含有“國”之意，也不善，而且時為多元文化說（multiculturalism）流行之際，於是有“多元文化事務辦公室”之設，把外國學生（國際學生）事務納入其內。國與國之間常有紛爭衝突，不

言“國”而言“文化”，語境柔軟了。名稱一改再改，為了求善，也可以說是為了“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在澳門，賭博稱為博彩或幸運博彩，賭場稱為“娛樂場”，博彩和娛樂場聽起來少負面的意思。博彩和娛樂場之於賭博和賭場，與gaming之於gambling一樣，是名稱委婉化（euphemized）的一種表現，是“善”的一種表現。認真嚴肅對待語言文字的人，往往因為世間種種名不副實的現象而感到遺憾，如常常又陰又雨的節候卻以“清明”為名。^⑤

在不同語言的翻譯中，專有名詞的翻譯也應該講求真善美。莎士比亞的名劇*Hamlet*海峽兩岸的通行譯名是《哈姆雷特》（筆者用小蒙恬手寫板輸入，一寫下“哈”字，其“聯想辭庫”第一個出現的辭彙就是“哈姆雷特”，這是這個譯名通行的証據之一）。以讀音而言，“哈姆雷特”是貼近原名的，這符合“真”的要求；然而此劇主角是行事肅穆、思維肅穆的堂堂男子漢而不是蛤蟆，譯名中“哈姆”二字卻音近“蛤蟆”，豈不可笑。筆者一向把*Hamlet*漢譯為“漢穆雷特”，卻遭報刊編輯刀筆一揮就削改為“哈姆雷特”。^⑥容筆者戲言一句，由於約定俗成，這是“劣譯驅逐良譯（樑譯）”^⑦。

三、“漢語新文學”正名的學術實踐

約定俗成有莫大的力量，“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名稱正如此；然則，把“中國現當代文學”正名為“漢語新文學”可能嗎？一方面，約定俗成是一股力量；另一方面，改革更新也是一股力量。事在人為。要在學術上實踐“漢語新文學”的正名，於這個實踐過程中，我們已有兩個穩固的基礎：一是“漢語”的使用，另一是“漢語文學”的使用。

王力力度驚人，其以“漢語”冠名的幾本大書，打下了“漢語”一詞的江山。幾本大書是：1955年的《漢語音韻學》、1957~1958年的《漢語史稿》（上、中、下，內容包括語音、語法、詞匯）、1958年的《漢語詩律學》和1964年的《古代漢語》（主編）。值得我們大加注意的是，《漢語音韻學》原題為《中國音韻學》（1936年），1955年修訂時改了書名；這是著名語文學者的“悟今是而昨非”。漢族的語言稱為漢語，用漢語寫的詩歌稱為漢詩，把外語作品譯為漢語稱為漢譯。這是順理成“名”的事，至今我們順著做；例如漢詩一名，從北京到首爾到美國加州都通行，新近的加州例子包括奚密（Michelle Yeh）著、奚密與宋炳輝譯的《現代漢詩》（原著為英文版的*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把外語作品譯為漢語稱為漢譯，其新近的例子是黃國彬的《解讀〈哈姆雷特〉——莎士比亞原著漢譯及詳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書名用“漢譯”而非“中譯”之詞，其前言則處處用“漢譯”和“漢語”之稱。王蒙自述學習外國語文，可“去掉〔……〕漢語所造成的思維定勢”^⑧；外國人學習我們的語文，應有同樣的思維價值。外國人學習的我們漢族的語文，稱為漢語：北京語言大學主辦的相關刊物名為《學漢語》（而非《學中文》之類）。採用“漢語”名稱的最大靠山是：我們最權威的相關詞典稱為《現代漢語詞典》和《漢語大詞典》。

“漢語”、“漢詩”、“漢譯”之外，學術界也常用“漢語文學”的名稱，例如：（1）張衛中：《漢語與漢語文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2）董正宇：《20世紀現代漢語文學語言整合的三條路向》，刊於《中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3期。（3）吉暉、曾丹：《對外漢語文學史教材編寫探究——兼評北大版〈中國古代文學史教程〉及〈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程〉》，刊於《語文學刊》2009年第2期。（4）王列耀：《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與特色——兼談有關新編中國文學史、漢語文學史的一些想法》，刊於《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

(5) 沈維瓊：《新世紀新疆漢語文學文化資源和主題精神》，刊於《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6) 王克非、胡顯耀：《漢語文學翻譯中人稱代詞的顯化和變異》，刊於《中國外語》2010年第4期。(7) 劉宇凡等：《唐代以來漢語文學作品中的字頻演變》，刊於《中文信息學報》2011年第3期。(8) 王青海：《滯後的當代性——從新疆當代漢語文學期刊看新疆當代文學的滯後性》，刊於《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

現在學術界要實踐的就是把“新”字納入“漢語文學”而成為“漢語新文學”，以取代“中國現當代文學”，為這個“含混”、“拼湊”、“紛亂”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正名。漢語新文學這個名稱的意義和價值，朱壽桐論述已精已詳，本文也已徵引過其多個觀點。以下通過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一名的比較，概述其意義和價值的所在：朱氏認為“漢語新文學”具有“學術張力”、“理論優勢”、“實踐價值”、“學術‘預後’”等優點。

“學術張力”指“漢語新文學”有彈性和張力，可用以概括“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新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台港澳文學”、“海外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等名稱及其內涵；“理論優勢”指用“漢語新文學”此名稱可使研究者“更沉潛更深入”著眼於這個語種文學的語言審美價值和文化內涵；“實踐價值”指“漢語新文學”可助研究者“彌平了由國家板塊、政治疏隔和地域分佈帶來的各種人為裂痕與人造鴻溝”，建立一個和諧發展的漢語新文學學科；“學術‘預後’”指“漢語新文學”將使研究者發現“中國新文學相對於其他離散的漢語新文學，其傳統輻射力、現實影響力及由此形成的中心地位將更加突出”。^⑫

有了上面的信念，“漢語新文學”正名之道應該是：（1）繼續以至永續（在台灣，“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sustainable譯為“永續”）使用“漢語新文學”之名：著述時用，教學時用，編訂課程時用；（2）以“漢語新文學”為題，定期舉行地區性或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用一般研討會名稱，或以“高峰論壇”之類為名，發表的論文須達高水平，並有論文宣述在名稱上用“漢語新文學”而不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優勢；

（3）向學術行政決策部門力陳“漢語新文學”名稱的意義和價值，希望相關部門從善如流，為學科正名。

爭取正名為“漢語新文學”的學者，當然絕對不會用訴諸語言暴力的手段，當然更絕對不會用訴諸身體暴力的手段，以求達到目的；爭取正名所用的，一定是文質彬彬的一種“軟實力”（借用近年流行的soft power一詞）。“真積力久”；如荀子所說，必形成學術的沛然力量。

就上述（1）而言，朱壽桐本人自2008年澳門大學“漢語新文學”講堂開講之後，其著述即經常用這一正名。2008年他與羅執庭聯合發表的論文用的是《學者身份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背景》（《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翌年朱氏發表的論文《“漢語新文學”概念建構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學術研究》2009年第1期：轉載於《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9年第6期及《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09年第2期）就更名了，就正名了。這一年是個分水嶺。同年正名的聲勢浩大，此文之外，還有兩篇也正了名。朱壽桐：《〈漢語新文學：作為一種概念的學術優勢〉》（《暨南學報》2009年第1期）；朱壽桐：《論漢語新文學文獻整理的地域性運作》（《徐州師大學報》2009年第1期）。至於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編著、2010年面世的《漢語新文學通史》上下卷兩大冊，上面已提過，正名之意不必再表。2011年他又主編、出版了新書《“漢語新文學”倡言》^⑬，書名中“倡言”自然是“提倡這正名之言”的意思。

在研討會方面，2010年4月澳門大學中文系舉辦的“漢語新文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上發佈的《漢語新文學通史》上下卷，同具有里程碑意義。2011年11月澳門大學中文系主辦的三個相關會議——8日的“葉維廉與漢語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9、10兩日的“金庸與漢語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2~24日（協辦）的“魯迅與漢語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則有近乎排山倒海的氣勢。朱壽桐策劃這些研討會，金庸、葉維廉等的作品，是漢語新文學這棵梧桐大樹的“金”枝玉“葉”。

飲品、化妝品的品牌形象代言人，用的怎能不是自己代言的飲品、化妝品？“漢語新文學”這名稱有豐富的營養，有美雅的價值；朱壽桐這正名的倡言人兼代言人，多年來一直以其雄厚的“軟實力”，在學術界同行支持下，通過種種學術的實踐，宣述“漢語新文學”正名的硬道理，擇善長持，其成功達至學科更名、正名的目標，我們自可期待。

四、餘論

除了朱壽桐的“漢語新文學”之外，近年有相關的新名詞被提出來：“華語語系文學”。2006年7月香港《明報月刊》發表《華語語系文學檢視特輯》，首篇文章是王德威的《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以下簡稱《行旅》），其論述主題即為“華語語系文學”。翌年12月，美國的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合辦研討會，以“全球化的中國現代文學：華語語系文學與離散寫作”（*Globaliz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inophone and Diasporic Writings*）為主題。會後李鳳亮訪問會議策劃人王德威，訪談的一項主要內容是“華語語系文學”，相關的訪談紀錄長達兩萬字（以下簡稱《訪談》），收於李鳳亮著《彼岸的現代性：美國華人批評家訪談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首先筆者要指出：“華語語系文學”的“語系”一詞不妥當。在語言學上，語系一詞相當於英文的family of languages。全球的語系，有漢藏語系、印歐語系、高加索語系等十多個。以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Family）而言，這個語系下面分為近十個語族；其一的日爾曼語族，又可分為英語、德語、荷蘭語、瑞典語、丹麥語等十多種語言。語系、語族之外，還有語支、語種的名目。漢語（粗糙地說，則為中文、華文、華語）屬漢藏語系（Sino-Tibetan Family），僅是漢藏語系的一部分。漢語雖然有吳、湘、粵、閩南等不同方言，雖然也有稱它為語族的，它只是一種語言，或可稱為語種，卻不能稱為語系。換言之，“華語語系文學”一詞弊在名不正，弊在不精確，容易引起誤會：誤會漢語是個巴別塔（Tower of Babel）般的語言大家庭，其中有多種語言。“華語語系文學”其實就是“華語文學”，就是“華文文學”。英文的language一詞，可指口頭的語言（spoken language），也可指該口頭語言的書寫形式，也就是文字（written language）。“華語語系文學”的“語系”一詞是多餘的，只會引起不懂漢語者的誤會。王德威在《行旅》中說，Sinophone literature的對應面“包括了Anglophone（英語語系）、Francophone（法語語系）……等文學”；在這裡他對“語系”一詞的誤用如出一轍。我們查閱Anglophone literature、Francophone literature的相關文獻，就知道研究它們的學者，雖然注意到不同地區、不同社群的英語或法語，有其語言的多種表達式樣（varieties of language），卻沒有把英語或法語當作語系，因為它們只是語言，不是語系。漢語的情形也如此。

跟著論“華語語系文學”涉及的思想意識。王德威在《行旅》中寫道：“華語語系文學……的版圖始自海外，卻理應延至大陸中國文學，並由此形成對話。”他的意思是目前“華語語系文學”指“大陸外華文文學”，日後“版圖”伸延了，可成為包括大陸文學的華文文學。“版圖”

論之外，王氏在《行旅》中又說，“華語語系文學的理念可以顯露不同陣營的洞見和不見”。他所說的“不同陣營”意指中國大陸這一“陣營”和各個海外華文社群這另一“陣營”。王氏又認為，近年大陸學者關注“世界華文文學”，“在羅列各色樣板人物作品之際，收編的意圖似乎大於其他”。我們可意會的是，前引的“版圖”、此處的“陣營”、“收編”幾個詞語，都帶有政治或軍事的色彩。在《訪談》中，王德威解釋“華語語系”（Sinophone）一詞時說：“語言在不斷地改變和擴散”，“它絕對不可能被一個很清楚的文化或政治的霸權所壟斷。”這樣看來，王氏提倡的“華語語系文學”，其針對性不言而喻。^④

①②③本段語意引自朱壽桐：《漢語新文學概念的第一波討論》，刊於2008年9月18日《文藝報》；此文後載於朱壽桐：《“漢語新文學”倡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所引見第387~389頁。

③朱壽桐主編：《漢語新文學通史》上下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頁。本文在以後的段落引述朱氏此文時，只在正文內標示頁碼，不另加注。

④對劣評的理由，尚可補充的是：“當代”意為當前這個時代。如把“當代”作為contemporary的中譯，則contemporary意為同屬一個generation（世代），而一個generation約為20~30年；因此，當代文學乃指最近20~30年的文學。林曼叔等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巴黎第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1978年出版）論述的是1949~1964年的文學；其用當代來指稱，完全正確。陸士清主編的三卷本《中國當代文學史》（1980年出版）論述的是1949以來的文學；其用當代來指稱，完全正確。1980年代中期以後出版或發表，論析1949以來文學的著述，在名稱上如果仍用“當代文學”，就有“年代錯誤”了，至少有此嫌疑。至於中國現代文學，學術界一般指1919~1949年的中國新文學或新舊兼容的文學，但現代（modern）一詞的時間性涵義可廣可狹：1919~1949年這個時間範圍是屬較狹窄的；要廣，則可擴大至“三數百年前至今”作為現代時期。若取此廣義，或只取“1919年至今”這樣的廣義，則“現代”顯然包括了“當代”。無論如何，一如朱壽桐所說，“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稱謂確是“含混”、“拼湊”、“紛亂”的。

⑤⑥引自朱壽桐：《論漢語新文學的文化歸宿感》，載於朱壽桐主編：《“漢語新文學”倡言》，所引見第45、47頁。

⑦近閱2013年4月10日《澳門日報》“新園地”賀越明的《更名與譯名》一文，正涉及“正名”，其言甚諦。

⑧錢鍾書1945年寫了一首詩，語帶諷喻，題為〈清明口號〉：“清明時節雨昏沉，名喚清明濫到今。也似重陽無實際，滿城風雨是重陰。”即述此現象。此詩轉引自《澳門日報》2013年4月10日《新園地》的潘耀明〈錢鍾書唯一的訪問記〉。

⑨詳見筆者《丹麥王子是蛤蟆？》一文，香港：《明報月刊》，2013年5月號。

⑩2013年1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黃國彬《解讀〈哈姆雷特〉——莎士比亞原著漢譯及詳注》一書，黃氏在其前言中，對“哈姆雷特”的譯名亦有譏諷性批評。

⑪見王蒙：《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頁。

⑫詳見朱壽桐主編：《漢語新文學通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2頁。

⑬關於“華語語系文學”和“漢語新文學”的論述，可參考拙文《學科正名論：“華語語系文學”和“漢語新文學”》，福州：《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作者簡介：黃維樑，四川大學“985工程”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創新基地講座教授，博士。
成都 610005

[責任編輯 陳志雄]